



【文化地标】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穿越回两千年的西汉侯国

□云韶

十一前夕，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正式开放。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容最丰富的汉代列侯墓葬，拿下了考古界诸多重量级奖项。随着媒体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广，海昏侯国遗址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持续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追捧。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开园首周，游客数已超过3万人次。

海昏侯国遗址，墓主是刘贺。提起这个名字，许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这个人历史上的名气可不小。《三国演义》董卓在废汉少帝时曾言，他此举效仿的是“伊尹、霍光”。伊、霍两人都是有名的权臣，他们都曾废黜过君主，伊尹将大甲放逐在桐宫七年，而霍光只让刘贺当了二十七天皇帝。

在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刘贺的墓葬。据报道，该墓葬平面呈梯形，占地约4.6万平方米，墓园内由两座主墓、七座附葬墓、一条外葬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和园寺舍等构成。园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附葬墓前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墓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高台。其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殿和祠堂组成。

由于刘贺生前为昌邑王，中途接汉昭帝之位，面南称帝近一个月，被霍光废黜后，以平民身份被幽禁在山东近10年，在汉宣帝年间当上了海昏侯。刘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将平民、侯、王、帝都体验过的人。刘贺墓因此也具有了同其他西汉列侯墓不同的气象。

这种气象，主要体现在刘贺墓的陪葬品上。《荀子·礼论》曾言：“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在古代，中国人一直奉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认为死者在阴间的生活，与阳间无二，因此，在为死者营造坟墓，埋入陪葬品时，大多仿照阳间的布局。典型的例子便是秦始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下寝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金银珠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刘贺的资历声望虽比不上秦始皇，但也曾面南称尊。尽管按照礼制，他不得按侯爵的规模兴修坟墓，也无法使用黄肠题凑和金缕玉衣，但是在陪葬品方面，刘贺和他的家人却动了不少“脑筋”，在一些礼制没有涉及或者规定不清楚的地方，刘贺大打“擦边球”，力图通过这些“细枝末节”展现出自己的帝王之气。

在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的博物馆中，便展出了海昏侯国遗址各类出土文物1200余件。这些文物大部分集中在“金色海昏——汉代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展”展区。该展区通过对海昏侯国遗址、海昏侯墓园的完整介绍以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展示了海昏侯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据了解，此次展出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很多都是首次对外展出，比如“南昌”铭文青铜灯、“海昏侯夫人”奏牍、“海昏侯家钱五千”封泥匣、套箱提取的五铢钱、战国蟠螭纹青铜缶等，都是不容错过的展品。

从这些展品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刘贺及其家人的“小心思”。据考古专家介绍，海昏侯墓曾出土三堵悬乐，按

照《周礼》中的礼乐制度，“四堵为帝，三堵为王”。那么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三架悬乐，明显高于“侯”的官职。此外，在海昏侯墓主椁室里提取了十个青铜鼎也不同寻常。关于墓葬里鼎的使用，西周时期有严格规定，帝王家也只能用九个。但是到了汉代，用鼎制度衰落，“鼎”的政治意义逐渐被剥离了，主要起到厨具兼餐具的用途。海昏侯墓的建造者在墓里放了十个鼎，也是为了显示其身份的特殊。有专家认为，海昏侯墓的修建是“按侯的规格、王的规模，透着帝的痕迹”。三种身份交织在一起，特殊而不僭越，这也是海昏侯墓的魅力之所在。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刘贺在南昌过得很惬意，可就大错特错了。虽然，霍光给出的刘贺被废的理由是“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但是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来看，情况却不是如此。从出土文物能判断，刘贺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他对孔子十分推崇，自己的老师王式便是一代大儒，汉代史书上也有关于他“簪笔持牍”形象的描述。他被废黜，更多是因为辅佐他的昌邑群臣对朝中局势的误判，以及他过早地锋芒外露而得罪了霍光。

像刘贺这样的人，即便不当皇帝，也是霍光的心头之患。因此，刘贺被废之后，被幽禁了起来，一直到霍光死去，他才被汉宣帝放了出来，当上了海昏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朝廷已经对刘贺“放心”。汉宣帝依然时不时地“提醒”一下刘贺，让他承认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刘贺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生怕哪天汉宣帝不高兴，又把自己给囚禁起来。这种不安的心情，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奏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昧死”“再拜”等格式用语的反复出现，可见刘贺家族在上书时怀揣巨大心理压力。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汉宣帝为了防止刘贺到长安串通“旧部”谋夺自己的皇位，下令刘贺不准进长安进行“秋请”。所谓“秋请”就是朝聘，是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的制度，按汉制，每一位被封在外地的皇室子弟，都有“春朝秋请”“侍祠郊庙”的义务。过往有观点认为，汉宣帝之所以如此，实质上就是不承认刘贺的皇室子弟地位。但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来看，汉宣帝似乎并没有这么绝情。有奏牍显示，刘贺也参与了“朝聘（秋请）”。专家猜测，很可能汉宣帝只是不同意刘贺本人亲自到长安朝觐，但允许其派遣使者，代表海昏侯国向朝廷春朝秋请。刘贺家族的奏牍写于元康四年六月辛未（十五日），很可能就是为了保证使者顺利抵达长安，代为秋请。

除了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海昏侯国遗址公园还有许多亮点。如“遇见海昏”展区，便是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一个常设互动展。为汉文化体验互动展厅，包含汉学书苑、衣冠礼乐、掌上海昏、穿越时空和巧夺天工等多个展项，互动性、趣味性在目前国内同类博物馆中处于领先水平。此外，遗址公园还开发了一系列有趣的文创产品，比如博山炉、折扇、胶带、帆布包等。其中，当卢钥匙扣和当卢书签最为特别，以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的两枚错金青铜当卢为灵感设计，颇为精致。当卢是一种挂在马额前的装饰，在当时是贵族的象征。

概而言之，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是一座文化宝库，期待大家进行探索，进行挖掘。

航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供图



刘贺墓出土的一对雁鱼灯。



复原的西汉王侯出行车马仪仗。



展出的金饼。



刘贺主墓出土的画有孔子的屏风。

【短史记】

眼镜的“进化史”

□邱俊霖

杜甫在《小寒食舟中作》中曾提到“老年花似雾中看”，说的是年纪大了后，连赏花这样美好的事都要受到视力下降的干扰。看来，一旦上了年纪便难以抵抗视力的衰退，今人如此，古人亦然。可是，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有老花或近视的人该如何解决阅读的问题呢？

其实古人很早便知道用凸透镜来帮助阅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经》就记载了许多有关光和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的论述。在汉代以及魏晋时期的考古挖掘中都出土过水晶石制作的凸透镜，说明我国古人至少在汉代就能用水晶石加工磨制具有放大功能的镜片了。

到了宋代，水晶镜片已广泛运用于生活中。北宋仁宗年间的进士史流，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的乡兼朋友，有史书记载，他在判案的时候，就用水晶制成的镜片阅读案卷。不过，这种镜片形制不是我们熟知的眼镜，而是无镜架的单个镜片，使用时用手拿着，就像使用放大镜。

至于人们常说的“眼镜”的雏形，出现年代大概在南宋。明末清初的学者张自烈在其著作《正字通》中解释道：“爰矚(ài dāi)即眼镜。”同时代的方以智在《通雅》中也有类似记载：“爰矚，眼镜也。”而爰矚一词的身影在宋代著作中便已出现。

南宋学者赵希鹄在其著作《洞天清录》中记载：“爰矚，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这里的“爰矚”显然便是帮助老花眼患者阅读的工具。此外，南宋学者祝穆在《方輿胜览》中曾提到“满刺加国出爰矚”。由此可见，在南宋末期，中国的“眼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舶来品。“爰矚”原是形容浓云遮日的样子，古人之所以将眼镜命名为爰矚，通常被认为是翻译自阿拉伯语。

虽然水晶镜片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早，不过西方人却让镜片能够更好地戴在脸上。目前公认最早的眼镜于13世纪出现在意大利，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可靠的验光技术，所谓的眼镜也不过是两片连在一起的放大镜，连支撑的镜腿都没有。

明朝初期，从西方传入了不少的西洋眼镜“爰矚”。明朝景泰年间的进士张宁在其著述《方洲杂言》中提到他见过两副眼镜，其中参政孙景章还告诉他，自己的眼镜是用良马从胡商那里换来的。这说明，在明代中西洋眼镜价格不菲。

在当时，眼镜的佩戴方法也很原始。明代画家仇英绘制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就有一位老者戴着一副眼镜，坐在挂有“兑换金珠”招牌的金店门口，这副眼镜并没有挂在耳朵上的两条镜腿，而是直接夹在鼻梁上。

但将眼镜夹在鼻梁上会影响呼吸，所以佩戴眼镜的方式需要不断改良。明代后期的田艺蘅在《留青日札爰矚》中提到眼镜时写道：“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就说明了明代后期，人们已经通过在镜架两端系线，然后将线挂于耳朵上或者缚于后来固定眼镜了。这种戴眼镜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

说到底，16世纪以前的眼镜，只能算是挂在脸上的放大镜，并不适宜长期佩戴。对于近视眼来说，在脸上戴个放大镜实在没多大用处，于是，人们对于眼镜的功能还在不断探索。明代后期，中国本土的眼镜制造工艺发展迅速。

晚明学者张萱在其著作《疑耀》中提道：“闽广之间有制眼镜者，老人目豁，以悬目中，则毫发立睹。”当时的福建、广东等地，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制作眼镜的手工艺者。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绘制于清代的《苏州市景商业图册》，里面有30余幅明末苏州街景图，其中一幅画中出现了一家“益美斋精制水晶眼镜铺”，里面便有一人在配眼镜，这应该是最早发现的眼镜店了。

此外，明末清初时，苏州还出现了一位名叫孙云球的杰出技师。他将学来的简陋且原始的光学知识具体化，成功制作出了各种凹凸透镜，同时又掌握了一套“随目对镜”的原始验光方法，可以按照人的年龄和不同的视力研制出老花、近视等品种的镜片，把我国的眼镜制造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

随着工艺的进步，不仅有老花眼的老人可以戴老花镜，近视的年轻人也可以戴眼镜了。到了清代初年，眼镜的价格一路走低。明末清初的学者叶梦珠在《阅世编》当中写道：“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眼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据说雍正皇帝很喜欢戴眼镜，他拥有的眼镜数量保守估计有三十余副。不过，作为雍正皇帝继承者的乾隆皇帝，却十分抗拒戴眼镜。直到88岁高龄，乾隆皇帝还写道：“古稀过十还增八，眼镜人人献百万。借物为明非善策，蝇头弗见究何妨。”表现出对戴眼镜的“不屑”。

虽然乾隆皇帝对眼镜很不待见，但同时代的西方人却对眼镜相当欢迎。18世纪50年代，西方已经出现了带有镜腿的完整眼镜架。1784年，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双焦距眼镜。1825年，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艾利发明了能矫正散光的眼镜。至此，眼镜的最终形态基本定型，后来除部分技术的进步，眼镜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态基本上已无太大区别了。